

孙科与抗战初期的中苏关系

王 军

抗战初期,身为国民政府立法院长的孙科,以其特殊的身分、地位,两度出访苏联,在争取苏联援助、促进中苏关系发展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本文试就孙科在抗战初期发展中苏关系时的作用作一初步探讨。

—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关系的恶化,客观上推动了中苏关系的改善。孙科是恢复中苏关系的积极倡导者。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幻想依靠国际联盟出面仲裁,强迫日本退兵。当时英美正忙于应付国内的经济危机,美国奉行“孤立主义”,英国与日本关系密切,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采取纵容姑息态度。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到中国调查后,发表了调查报告,日本却对此置若罔闻,甚至宣布退出国际联盟,使蒋介石依靠国联和英美的希望落空。

与此同时,尽管中苏已经绝交,但苏联在外交上、道义上和行动上都给中国以同情和支持,认为日本的侵略对中苏两国都是严重威胁,中苏两国应联合起来,协力制敌。为使两国关系正常化,苏联方面提议中苏应立即复交。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孙科极力主张抵抗。为此,他于1932年3月向国民党四届中央委员会提出《确定长期抗日方针案》,同年4月,又在上海《时报》上发表了《抗日救国纲领草案》。孙科认为国难当头,中国“唯有抵抗,才能开辟外交上敏活之途径”^①。孙科

盱衡国际局势,认识到对苏外交的重要性,他从联苏制日出发,希望蒋介石能早日促成中苏复交。孙科认为这样可以对日本在华势力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并由此引起苏日之间的冲突。蒋介石正是从孙科等人的考虑出发,同时也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才被迫同意中苏两国于1932年12月12日复交。

此后,孙科积极主张要进一步发展中苏关系。在复交后不久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上,孙科提交的《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中,再次强调要以抗日为外交中心,同时“为求远东安定,注重中苏邦交”^②。接着,孙科一面奔走呼号,劝说蒋介石要彻底改善中苏关系,一面身体力行,于1935年10月发起组织“中苏文化协会”,出任会长,积极开展国民外交活动。

但实际上,复交后中苏两国关系的发展非常缓慢。这一时期的中苏关系,主要是围绕着中苏条约的签订问题而展开的。缔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最早是由中国方面提出的,但后来蒋介石、国民党却蓄意拖延关于缔结协定问题的谈判。究其原因,主要是怕影响同日本的关系。他们既想同苏联结盟,以抗衡日本;又不想立即正式结盟,以免导致日苏关系紧张而刺激日本,加深中日矛盾。因而他们采取的策略是在与日苏两国外交间搞平衡。因此,国民政府在同苏联改善关系的同时,又与

① 孙科:《确定长期抗日方针案》,《孙科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1202页。

② 孙科:《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汇编》(二),第73页。

日本进行谈判。这种平衡外交政策,反映出国民党对苏联的不完全信任和对日本改变其侵略政策的幻想。这不仅不可能彻底改善中苏关系,对本国和本民族也极为不利。1940年,孙科在谈到中苏关系时说,回顾“九·一八”这段不幸的历史,“觉得假使当时中苏关系不恶化,十六年(1927年)没有反共绝共的事件,两国维持友好的革命外交关系,以苏联为与国,也许敌人对我不敢发动侵略。因为敌人知道已与其革命过程中的唯一与国断绝关系,乃胆敢肆其侵略野心”^①。

这样在时急时缓的“缔约”谈判中,1937年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国民党的平衡策略破产,而英美这时又推行绥靖政策,蒋介石、国民党无可奈何中才被迫转向苏联。孙科也借此机会,劝蒋放弃对日本的幻想,尽快与苏联缔约,同时多次代表国民政府与苏驻华大使商谈缔约事宜。

事变后不久的7月13日,孙科在上海约见鲍格莫洛夫,将南京政府外交部就卢沟桥事变给英、法、美的照会交给苏联大使,以表明中国政府放弃对英、美的幻想。两人还就华北事态及此后中苏两国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孙科说:“中国政府认为形势极为严峻,他担心会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卢沟桥事变刚发生时,蒋介石认为“冲突只不过是地方性的,不久便将消除”;但“近来事态表明,冲突的规模越来越大,可能引起大的麻烦”。孙科认为“冲突可能发展为中日间的公开战争”。他郑重表示:“中国政府决定不再退让领土并已向河北以及保定派兵”。孙科问鲍格莫洛夫,中日战争对苏联与伪满国边界地区的局势会有什么影响?鲍认为,这是孙科在试探中日战争爆发后苏联是否会帮助中国,或是问日本是否会同时向苏联出兵?鲍模棱两可地回答说:“眼下敝人尚难以就此问题发表看法。”当谈到中苏两国关系时,孙科婉转地批评了蒋介石的对苏政策,认为它“过于拘谨,而他(孙)本人和冯玉祥是想使中苏关系积极

化的”^②。7月16日,孙科再次会见鲍格莫洛夫,着重谈到两国关系问题。鲍格莫洛夫重述了苏联关于请中国政府发起太平洋公约的建议。孙科则详细阐述了“中国政府不能承担太平洋发起”者的理由,主要是“日本反正不会同意,即使会同意,那日本就会要求承认满洲国”^③。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逼迫下和孙科等国府要人的压力下,蒋介石暂时放弃了对日本的幻想,同意于1937年8月21日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从中苏复交到《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孙科为促使蒋介石放弃幻想改变政策作了大量工作,为中苏关系的彻底改善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二

争取苏援是蒋介石与苏结盟的目的所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缔结后,蒋介石立即派以杨杰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赴苏,争取苏联业已允诺的军事援助。中国军事代表团的访苏活动取得很大成绩。但它毕竟是军事代表团,不便于展开广泛的、高层次的外交活动。因此,蒋介石决定派立法院长孙科率团访苏,旨在通过中苏间的高级会晤增进两国关系,争取更多的苏援。

孙科1938—1939年的两次访苏是抗战初期蒋介石展开高层外交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孙科被称为国民党内的亲苏派,是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由于孙科的“亲苏”态度,同时也因孙中山的关系,苏联对孙科有着良好的印象。所以,由孙科率高级代表团访苏,是最合适的人选。

孙科出访前,蒋介石指示此行的目的是

① 孙科:《中苏关系》,中华书局1942年版,第12页。

②③ 参见李义彬:《南京国民政府的联苏制日方针》,《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

要“对苏联安抚一番”^①，意即暗示苏方，中国不可能把苏联撇在一边去同日本人进行和谈。以此希望苏方打消疑虑，而能给中国更多的援助。同时，蒋介石还希望孙科能劝说苏联参加对日作战。

1938年1月中旬，孙科第一次出访，他是取道欧洲到苏联的。1月17日到达莫斯科，在车站受到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的欢迎。在孙科到达的最初几天，苏方先安排他列席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进行了参观，随后开始了与苏方领导人的会晤。

1月21日，孙科首先同斯托莫尼亚科夫进行了会谈。斯托莫尼亚科夫称赞孙科对密切两国关系作出了“富有成果的努力”。孙科在谈话中表示，他始终认为，中苏两国应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不仅可以保证远东和平，也可以使日本不敢进攻中国。孙科还说，中国人民在抗击侵略者时，从苏联的同情和支持方面获得了力量。如果这一援助将持续的话，中国很快就会取得抗战的胜利。斯托莫尼亚科夫则表示，苏联对中国人民确实充满着热烈的同情，热切希望他们取得胜利，并对中国近来军事形势的改善和游击战争的发展表示满意。在双方相互交换了对两国关系的基本看法后，孙科告诉斯托莫尼亚科夫，他受中国政府委托访苏的目的，就是搞清同苏联更密切合作的可能性。这种更密切合作就是中国同苏联的合作不仅必须在现时，而且必须建立旨在稳定远东和平的共同工作的基础。显然，孙科说的这种合作，不仅是就战时，而且还从战后更长远的意义上来考虑发展中苏关系的。最后，孙科请求斯托莫尼亚科夫向斯大林和加里宁转交他带来的一些信件并请求同这些高级领导人会谈。斯托莫尼亚科夫欣然允诺^②。

这次会谈虽没有解决实质性问题，但加强了中国两国间的友谊与合作的气氛，为以后孙科与苏方高级领导人的会谈打下了良好基础。

2月初，苏联的党政军首脑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人会见了孙科。会见中，双方推心置腹，畅所欲言。特别是斯大林，对中国抗战的决心和勇气推崇备至，并对中国将士和民众表示无限敬意。斯大林对孙科说：“如果中国竭尽全力抗战，就不会因临时的受挫和国土被敌占领而沮丧，这样最后的胜利必定是中国的”^③。斯大林的话使孙科倍受鼓舞，两人的会谈竟从午夜直至凌晨五时。这次会晤中，孙科的最大收获就是融洽了与斯大林的感情，当然也是中苏间的感情，从而有利于争取苏援。正是这次高级会谈之后，中苏双方签订了两笔各为5000万美元的贷款协定。

随后，孙科又与李维诺夫进行了会谈。会谈主要由李维诺夫介绍了国联日内瓦会议有关远东问题的情况。中国政府当时曾要求国联采取措施制裁日本，西方国家优柔寡断，意见不一。李维诺夫认为，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美国的立场，美国还不想实行制裁，因而西方国家就难以协调行动了。孙科对苏联的支持表示感谢，并认为“苏联是给予中国援助的唯一国家”^④。

孙科与苏联领导人会晤后，2月下旬在莫斯科参加了苏联红军建军20周年的纪念活动，随后离开莫斯科。3月初来到巴黎，在法国展开抗战外交活动。不久，因为苏联给中国的第一笔贷款已用完，孙科受命再次回莫斯科，与苏方商谈第二笔贷款事宜。孙科返莫斯科后，立即晤见斯大林。会晤中，斯大林表示，中国借款已超过中国法币1亿元，可将第一笔贷款改作5000万美元，相当于2亿元法币，同时再给予第二笔借款5000万美元^⑤。斯大林的慷慨援助，及时帮助中国解决了用

① 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3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8页。

②③④ 参见王真著：《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80、81、81页。

⑤ 孙科：《中苏关系》，中华书局1942年版，第17页。

贷款购买军火的问题。孙科成交这两笔贷款后便重返巴黎,签字事宜由杨杰办理。孙科初次访苏使命完成。

1939年春,孙科受命第二次访苏,主要目的是商谈苏联援华的第三笔贷款。孙科于4月7日抵达莫斯科。此次来访与苏方高级领导人的会晤不如上次顺利,因此时欧洲局势日趋紧张,苏联政府把主要注意力也放在了欧洲,而对远东和中国事务的关注开始减弱;同时英、法代表团为能与苏缔结军事协定也在莫斯科频繁活动。这对孙科的访苏活动不能不产生影响。

孙科到莫斯科后,于4月8日首先拜访了李维诺夫,请李向斯大林转达会见请求,并转交有关商洽事件的文件。李维诺夫答应了孙科的请求。随后,孙科又见了当时的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卢干涅兹一奥尔斯基(孙访苏时,他正在莫斯科),催约见日期。从卢氏口中得知斯大林、莫洛托夫正在出巡,须等他们回来再定。20日,孙科再访卢干涅兹一奥尔斯基,知道斯大林已回,但未定约期。这之后,孙科提出会见伏罗希波夫,求见莫洛托夫,都因种种原因一再延期。

由于一直未能会晤苏联首脑,孙科有些焦急,便将情况电告蒋介石,蒋立即回电孙科,劝他“忍耐进行,继续交涉,以期有成”^①。

在等待与斯大林会面的过程中,孙科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波将金进行过一次较为详细的会谈。会谈中,孙科表示此次来访的目的是请求苏联政府更为广泛和有效地帮助中国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孙科认为,中国人民相信自己的力量能够对付敌人,但因中日战争是持久战,苏援所以必须,就在于它可以加速战胜日本。

孙科与斯大林的会晤直到他抵达莫斯科数周后才实现。苏联此时外交政策的中心虽移向欧洲,但其援华政策并未改变。斯大林与孙科只会晤了一个小时,询问了中国抗战情形,便欣然同意可向中国提供第三笔贷款1.5

亿美元,并表示“苏联极愿照办,没有什么问题”;^②并当即嘱咐苏对外贸易委员米高扬与孙科签订合同。对此,孙科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称:“此次苏联当局对我们政府请求援助,答复诚恳比前尤见爽快”^③。

会晤中,孙科还提出了签订中苏商约的问题。其实,关于缔结商约问题,早在中苏复交后不久苏方就首先提出了。由于蒋介石在发展中苏关系时过于“谨慎”,而亲日派汪精卫等人又从中作梗,所以迟迟未能缔结。全面抗战爆发后,苏联大力援华,中国需偿还贷款,使双方经贸往来频繁,因此迫切需要有一商业性条约,为双方经贸活动的开展提供保障。还在孙科赴苏前,国民政府就将缔约的有关文件,让孙科携带前往。斯大林听了孙科的陈述后,指示米高扬同孙科具体洽谈此事,“更表示希望中苏商约能早日成功”^④。

孙科与米高扬就中方拟就的商约草案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修正,6月17日,孙科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正式签字。中苏商约,主要规定了双方货物进出口时,其关税不得异于或低于第三国待遇,不得设立不适应于来自任何第三国同样货之任何禁令和限制,易货须经该国所设关卡之商埠,而不得私运等。这是一平等互惠的条约。中苏商约的签订把两国关系推向了一个高潮。这正如孙科所说,“商约签订以后,双方根据合约进行,几年间,关系相当好转”^⑤。

孙科第二次访苏虽费时多日,但终于取得了圆满结果。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关于请求苏军参战问

①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台北,1981年1版,第412页。

②⑤ 孙科:《中苏关系》,中华书局1942年版,第17、18页。

③ 陈鹤龄:《孙科与近代中国》,《广东文献》18卷4期,1988年12月。

④ 见王真著:《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

题。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曾迫切希望苏联能直接参加对日作战,并把苏军参战与否看作是中国抗战胜败的一个关键因素。对苏军是否参战问题,1936年底,当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的蒋廷黻在了解了苏方意图后,就曾预见苏军不会参战。但这一观点并未引起蒋介石的重视,同时还被蒋认为是“误解苏联的意图”^①,1938年初,蒋廷黻被解职回国。抗战初期,杨杰在赴莫斯科洽谈军火援助时,曾多次向苏联领导人提出要苏联参战的请求,均遭拒绝。为达到使苏出兵的目的,杨杰还为蒋介石出谋划策,但也因不够实际,未能奏效。

孙科也是极力主张苏联参战的。七七事变爆发前不久,孙科在与鲍格莫洛夫会谈时就提出,“如果目前的危机持续增长,中国政府是否可以期待苏联政府会将军队自满洲边境进行某种调动”^②。1938年,孙科首次访苏过程中,通过与苏方领导人的会谈,了解到第一手情况,对此问题的看法有了变化。2月7日,孙科电告蒋介石:“苏联愿始终相助,促我胜利,但若立即参战,则以国际时机未至,仍留有待,俟时机成熟,如经国联决议制裁,至少亦得英、法、美与苏一致,始能动兵。此时若苏独自出兵,恐将促成日本上下团结,促成德意更积极助日,分裂国际对我同情,引起苏联助我赤化误会,反于中国抗战甚为不利。”^③由于孙科的身份、地位与蒋廷黻不同,所以孙科的看法在蒋介石看来更易接受,并对蒋态度的变化确实发生了一些作用。这在孙科再次访苏的言论中有明显表现。

孙科第二次出访与波将金的会谈中,在谈到关于苏军参战问题时,孙科表示,中国要求苏联援助绝不意味着要苏联直接参加对日作战,而是指向中国提供所需物质资料和国际上组织对中国的援助^④。

9月17日,孙科又向蒋介石发电报,认为“苏联对倭(指日本)取严防痛击态度。但若倭知难而退,不再挑衅,苏只求保境息争,亦

无与倭决战决心,故在远东,……苏不愿发动苏倭战争,我与彼接洽,切忌要求参战,转移中倭战争为苏倭战争。以科愚见,苏援我程度,似限于器械供给与技术协助,若求其仗义参战,解决战局,恐不可能”^⑤。孙科是国民党内高层领导集团中最先认识到苏联不可能参加对日作战者。两次访苏的实地考察经验,使他的认识变得现实了,也因为如此,他的访苏使命才得以圆满完成。孙科的认识对蒋介石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蒋介石在苏军参战问题上态度转变只是短暂的,目的是为了急于得到苏军的援助。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蒋介石又重提参战问题,使中苏间在此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终于导致了两国关系的逆转。

总之,孙科两度访苏,先后争取到苏联2.5亿美元的贷款和军事上的大量援助,缔结了中苏商约,促进了中苏经贸往来。孙科访苏期间与苏联高级领导人尤其是与斯大林的直接会晤,增进了两国友谊,改善了两国关系。这一切都充分显示了孙科在对苏外交中的贡献。而这一时期苏联的援助对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作者王军,1964年生,湘潭大学历史系讲师]

①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第201页。

②④ 王真著:《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145、83页。

③⑤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1981年版,第407页。